

维·什克洛夫斯基

动物园，或不谈爱情的信札（之一）

一个女人自柏林写信给她在莫斯科的妹妹。她妹妹长得十分漂亮，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此信就当开篇。请听一位女人平静的声音。

我现在已经住惯了这套新租的房间。我疑心，我的女房东从前是一个喜欢寻欢作乐的女人，所以性格不坏，也不苛刻。在我住的这一带只讲德国话，不管从哪儿来，都得钻过十二道铁桥。这样的一个地方，假如不是有特殊的需要是不会有人来的。在文德·根·林登街上的那些熟人就算顺路也不会来拜访来。

围着我转的仍旧是那几个男人，他们都不屈不挠。那个排第三的粘定我了。虽然我知道他对人特别容易动情，我还是把他视作是我最大的一枚勋章。每天他都给我写一两封信，并亲自送过来，安静地坐在我身边，等着我把它们看完。

第一名迄今还不断给我送花，可是抑郁不乐。第二名，即你轻率地将我托付给他的那一个，仍坚持声称说他爱我。还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我把自己的一切烦恼都向他倾诉，以回报他对我的爱。真有心眼。

现在汽车的限价涨了五千倍。

虽然在这里生活安定，我却怀念伦敦。怀念在那里孤身一人时的日子，有节奏的生活，从早到晚的工作，浴盆以及和漂亮的小伙子们的一起跳舞。到了这里，对这种生活我渐渐地生疏了。但身边的痛苦太多，我连一分钟都无法忘怀这种生活。

尽快给我回信，说说你的一切。吻你，亲爱的、最漂亮的美人，再一次谢谢你的爱与温情。

阿莉娅

1923 年 2 月 3 日



伊·巴别尔

开　　始

二十年前，当时我还很年轻，口袋里装着一张假身分证，在圣彼得堡市内游荡，正值严寒的冬季，我却没有穿大衣。应当承认，大衣我倒是有的，但是根据原则性的理由，我没有穿它。那时候我的全部财富就是几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不仅很短，并且也写得很不合规矩。我把这些短篇小说送到各个编辑部去，但谁也不想看它们，即使偶然它们让什么人看到了，也只会产生相反的作用。有一家杂志的编辑让看门人给我送来了一个卢布，另一个编辑说我的稿子纯属是胡说八道，不过他的岳父开了个面粉店，我可以去这个面粉店里当店员。我谢绝了，而且明白，这只有去找高尔基，此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

当时在彼得堡出版了一份国际主义的杂志《年鉴》，它仅仅出了几个月，就已经成一份最好的月刊。它的主编便是高尔基。我到大货币街去找他。我的心在狂跳，忽而又停止跳动。编辑部的会客室里聚集着你所能想象到的形形色色不寻常的人：上流社会的夫人们和所谓的“无业游民们”，阿尔扎马斯的报务员们，反正教仪式教派的信徒们，还有一些拥有私宅的

工人和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

接见应该在六点钟开始。六点正，门被打开了，高尔基走了进来，他的身材和他消瘦的程度，他的力量，还有被那粗大的骨骼，一双坚定的小眼睛里散发的蓝光，那套穿在他身上的显得又肥又大，然而又十分考究的进口西装，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惊讶。我说：门是在六点整打开的。他一生始终不渝地守时，守信这一属于国王们和那些十分精明能干、对自己很有信心的保守派工人的美德。

会客室里的客人分成了两部分——送稿子的人和等待决定自己命运的人。

高尔基走到第二部分人里。他的步伐轻快，没有声音，我要说，那是优美的，他手里拿着一些练习本。其中有几本，他写的比作者写的还要多。和每个人谈话时，他都是那样聚精会神，并且谈得很久，倾听对方谈话时，又是那样专心，那样全神贯注，集中注意。自己的意见，他总是直接地说出来，而且说得很严厉，字斟句酌，只是在很久过后，过了几年和几十年，我们才会了解这些话的意义。那时候这些话已经在我们的心灵中度过了一段很长的，不可避免的时间，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和方向了。

高尔基在和他已经认识的作者们谈完了以后，就走到我们这里来，开始收集稿子。他向我看了一眼。那时候我是个面部红润、丰满，乳臭未干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混合体，还没穿大衣，但是戴着用打了蜡的线捆着的眼镜。

事情发生在星期二。高尔基拿过练习本去，说：

“星期五过来听回音。”

当时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不现实的，一般手稿会在编辑部



里呆上好几个月，稿纸都腐烂了，更经常的是——会永远躺在那里。

星期五我又回到了那里，遇到了一些新人——同第一次一样，他们当中有公爵夫人和反正教仪式教派的教徒，工人和僧侣，海军军官和中学生。高尔基走进屋里，又匆匆向我看了一眼，但是他却把我留到了最后一个。大家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马克西姆·高尔基和我，我好像是从另外一个星球上掉下来的，来自我们自己的马赛港（我不知道是否需要说明，我指的是敖德萨）。高尔基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他在那里所说的那些话决定了我的命运。

“钉子有细小的，”他说，“也有大的——就像我的手指这么大。”说着，他就把一根塑造得有力而细致的、长长的手指举到我的面前。“作家的道路上，尊敬的调皮孩子（重音读在O上）布满了钉子，主要是大的。不得不光着脚在钉子上行走，会流很多的血，而且年复一年流得更多……您是个软弱无力的人——会收买您并贩卖您，会向您提出许多请求，让您苦恼不堪，会麻醉您，而您将会变得萎靡不振，却装作好像是一棵盛开鲜花的树。对于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直的文学工作者和正直的革命者来说，在这条路上走过去是极大的荣誉，我祝福您，先生，去进行如此艰巨的行动……”

应当认为，在我的一生当中，没有比我在《年鉴》编辑部里度过的那几个小时更为重要的时刻了。从那里出来以后，我完全丧失了我这个人在肉体上的感觉。周围是一片蓝光，零下三十度的刺骨严寒，在这样的背景上，我却仿佛处于梦呓之中，在首都豪华而巨大走廊上奔跑，在广阔而遥远的、黑暗的天空中奔跑，直到把黑河和新村都留在了自己后面，这才清醒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过来。

夜已经过半了，只是在这时我才认得回到去彼得堡的方向，回到昨天晚上我租下的那间房子里，这间房子是向一个工程师的妻子、一个年轻并毫无生活经验的女人租下来的。当她丈夫下班回来以后，他仔细审视了一下我这个神秘的年轻人，吩咐我从前室里拿走所有的大衣和套鞋，把从我的房间通往厨房的门锁了起来。

却说，我回到了自己的新住处。隔壁就是前室，它已经失去了本该放在那里的套鞋和斗篷。喜悦在我心中欢腾，使我浑身暖乎乎的，它在折磨我，请求得到发泄。但是没有什么可供发泄办法。我站在前室里，不知是在对什么微笑，自己出乎意料地推开了厨房门。工程师正和他的妻子喝茶。在这么晚的时候看见我，他们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尤其是他们的前额，白得更厉害。

“开始了，”工程师想，并且作好了思想准备，想要把自己的生命卖一个很高的价钱。

我向他那边走了两步，对他承认，马克西姆·高尔基答应了发表我的几篇短篇小说。

工程师明白他搞错了，竟把一个“疯子”当作小偷，于是他的脸色白得更厉害，更像一个死人了。

“我想把我的小说念给你们听听，”我说，便坐下来，把人家的茶杯挪到我自己面前说，“就是他答应要发表的那几篇短篇小说。”

我那些作品内容的简短可以与我忘记了的礼貌相比美。对于那些善良而好心人来说，幸亏我那些作品中的一部分并未问世。它们被从杂志上剪了下来，成了同时根据两条法律向我起



诉的证据——企图推翻现存制度和诲淫。法庭本应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开庭审判我，但为我辩护的人民二月底举行了起义，烧掉了起诉书，与起诉书一起，连同区法庭的房子也给烧毁了。

当时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就住在冠状外堡大街。我把我写的稿子全部都拿给了他，而那时我一天就能写一篇短篇小说（以后我不得不放弃这一写作形式，从而陷入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极端）。高尔基把所有的稿子都看了，所有的稿子都被他否定了，但他要求我继续写下去。但最后我们俩都累了，他用他那稍带有点儿喑哑的低音对我说：

“已经十分清楚，先生，您什么也没有理解，不过您领悟了的东西倒不少，因此请您回到人间去吧！”

于是第二天我一觉醒来，便成了一份尚未诞生的报纸的记者，口袋里装着两百卢布的出差费。那份报纸却始终也没有诞生，不过那笔旅费对我却挺有用处。我的出差维持了七年，许多道路都被我走遍了，我的许多战斗的目击者。过了七年，在复员以后，我作了发表作品的第二次尝试，接到他给我写的一封短简：“好吧，现在又可以开始了……”

于是他的手又开始热情和不断地推动我。要不停地、并且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增加地球上一切需要的和美好的事物的数量——他向成千上万由他发掘和培养成长起来的人提出这一要求，并通过他们向全人类提出这一要求。对于人类创作空前未有的热情支配着他，这样的热情一刻也不会削减。当发现他给予厚望的人毫无成就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十分难过。而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时，他就会感到幸福，并且高兴地搓着手，向世界、向天空、向大地眨着眼睛……



尼·莫斯克温

一个画家的见解

……不，我可不敢为广为人知的、人人喜欢的作品作插图。可能您会问：“是不是因为太难作画？”“不，很简单。”如果我这样回答，请您不要认为我是个奇怪的人。真的，给这类作品作插图要比给某些乏味单调的小说画上插图简单得多，因为某些小说中所假设的、缺乏生气的主人公读者几乎难以想象。在经典性的文学作品中倒正好相反。要知道，我是在《带叭儿狗的女人》中看到了安娜·谢尔盖叶夫娜的形象的；在《草原》中看到了吉什卡的；我还形象的看到了约杜施卡·哥略夫里约夫、皮埃尔·别祖霍夫、司梯瓦·奥布浪斯基以及其他一些人物。尽管我看到了他们的形象，就很简单将他们搬上画面。

简单倒是简单，但是这样好吗？这于读者有益吗？

应当说，长期以来我对此没有细想过。我曾百倍十足地给《包法利夫人》、《夏伯阳》、《贵族之家》、《带阁楼的房子》及《决斗》等书作过插图。《安娜·卡列尼娜》我现在还没画……



在接受为这部长篇小说画插图的任务以前，我去了托尔斯泰博物馆，想仔细地看看，认真地想想。在博物馆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自然，这不是对别的什么人，而是就我而言。以前，我对这类作品作插图时，常常漫不经心，现在我感到惊骇，我震动了！以前，我怎么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使我警觉起来的第一件事，是那些在我之前为《安娜》一书所做的插图。中间，许多幅插图不论是结构、色彩和人物情绪表达都是无懈可击的。可是，我却感到惘然。这里所画的并不只是托尔斯泰的司梯瓦·奥浪斯基！这并不是托尔斯泰的那个卡列宁！那个渥伦斯奇也不对！喏，当然，这也非书中的那个安娜！不但这样，似乎那个对其要求不能过高的小谢廖沙也画得不怎么对。

可是，该怎样理解“画得不对”呢？那就是说，主人公的模样不如我所想象的，不象我心中所保有的形象。可是，老是“我，我”的好不好呢？这是否有点儿狂妄自大呢？这不是目中无人了吗？

不，这并不是目中无人。后来我就这询问过许多人，他们都回答说：“是的，我想象中的安娜也几乎是另外一个样子。还有渥伦斯基与卡列宁也都是另一个样子。

换而言之，读者为这些插图而感到困惑。这正象你在街上看见一个人，先向他打招呼说：“您好，”而接着又说：“对不起，我认错人了……”一样的令人窘迫。这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每个人对主人公都有各自的想象。

可是，虽然很少，却仍然可以听到喜不自胜的赞叹声：“啊！我想象中的他（或她）就是这个样子！”奇怪的是，小说中的次要的陪衬人物并没有使人失望。这是由于我们对他们

不太熟知，所以不论插图作者怎么描画他们，都能够过得去。

总之，以前别人所创作的《安娜》的插图勾起了思考与疑惑。可是，一幅不大的妇女油画像却解决掉了这个问题。在这幅肖像的下边博物馆学专家耐心地作了如下的注释：这位妇女曾经是作者刻划小说的主人公形象的原型。

这几乎令人骇然！从画像上看，她并不是我心中所想象的安娜。更糟糕的是，这一次可不是哪一个插图作者，而是小说作者本人——托尔斯泰扭曲和破坏了他在我心目中所建造的形象。

人总是希望能够得到慰藉。当我领悟到，所谓的原型还并不一定等于形象，作家有塑造形象时常常要增加与摈弃许多东西，于是，我的心便得到了慰藉……

尽管我的心可以平静下来，可是在我目睹这一切之后，我依然停止了给经典性作品作插图的工作。照我看来，这不仅无补于事，而是对原著的破坏。道理显而易见：我不愿重复我在别人所作插图中所感受到的缺憾。自然，那些对自己所作的插图感到满意的人，还将继续画下去。



帕乌斯托夫斯基

米哈伊洛夫斯克小树林

我已不记得是哪位诗人曾经说过：“诗材处处有，只需俯拾工。”

那是稀疏地落着雨的一个清晨，大车驶进了古老的松林。在路边的草地上，有什么东西泛着白光。

我从车上下来，弯下腰，牵牛花丛中的小木牌呈现在眼前，上面有黑色的题词。我扒开潮湿的牵牛花茎，看到几乎被忘却了的诗句：“在每个不同的年代，米哈伊洛夫斯克的小树林啊，我曾经来到你的树荫下。”

“这是用来干什么的？”我问车夫。

车夫笑了笑说，“米哈伊洛夫斯克，从这儿起就是亚历山大·谢尔盖依奇的土地。这里到处竖着这样的标记。”

后来，在一些全然没有料到的地方我都见到这样的小木牌。在索罗季的未割刈的草地上、在从米哈伊洛夫斯克到三山村路边的土坡上、在马列涅茨和彼得罗夫斯克湖岸上——从草丛、丛石南花丛、从干枯的草莓丛里，处处都有普希金的随便的一些诗行发出声音。只有树叶、鸟群和天空——那暗淡和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怯的普斯科夫的天空在倾听这些诗行。“再见吧，/三山村，/在这儿欢乐曾多少次将我相迎！”“我看见了两片碧蓝碧蓝平镜似的湖水。”

有一次，在胡桃林中，我迷了路。隐约可见的小道消失在树丛中。像这样的路大概只有一个赤脚的提着越橘的女孩儿一个星期才走一次。然而即使在这儿，在这个丛林里，我也见到了一块白色的小木牌。小木牌上面是普希金给奥西波娃的信摘录：“我能把萨夫金诺这块地方购置下来吗？我要在这里盖起一座小木房，摆上自己的书，并且前来在我的老友和好友之间度过几个月。”

我猜不出这段话为什么忽然在这儿出现。但小径很快就把我带到萨夫金诺小村。在那儿，成熟的燕麦波浪一样延伸到低矮的村舍的屋檐下。小村里看不到任何人，只有生着一双灰暗眼睛的黑狗，从篱笆里向我吠着，还有周围小山上的矮松发出的轻轻的沙沙声。

我几乎走遍全国，见到很多令人惊异和扣人心弦的地方，但是它们之中没有一处像米哈伊洛夫斯克这样意想不到的抒情力量。那里荒凉寂静。云儿在高空游动。云朵顺着绿色的山冈、顺着湖泊、顺着古老的公园的小径，掠过一片阴影。只有蜜蜂单调的嗡嗡声打破沉寂。

在普希金与安娜·凯恩会面的高耸的菩提树的林荫小径上蜜蜂在采蜜。菩提花已经谢了。一个手捧书本的瘦小、愉快的老太太，经常坐在菩提树下的小长凳上。一枚古老的绿松石的胸针别在她的薄纱短衫的领子上。老太太读着费定的《城与车》。她是安娜·凯恩的孙女——从前省城的话剧女演员——阿格拉雅·佩热夫斯卡娅。



她还记得她的祖母，而且乐于谈到她。她不喜欢这位祖母。很难去爱一个昏聩的百岁老太婆——她为了一口好吃的在吃饭的时候跟自己的孙女争吵。孙女们比祖母更厉害，她们总是抢走她的好吃的，安娜·凯恩因为受了讨厌的女孩子们的欺侮于是哭泣。

第一次遇见凯恩的孙女我是在土质松散的山坡上，那儿从前生长着三棵有名的松树。但现在都没有了。还是在革命前，两棵松树被闪电烧毁了，剩下的一颗被济马尔小村当磨坊工的小偷在夜间给锯了。

普希金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决定在老地方种上三棵新幼松。由于没留下点儿树桩寻找老松树生长的地点是很难的。当时便召集了集体农庄的老头子们，以便精确地断定三棵老松树长在哪里。

老头子们争论了一整天。意见应该是一致的，但是从捷里格拉佐夫来的三个老头子提出疑问。等终于说服捷里格拉佐夫人后，老头子们开始步量山坡，估量着，直到傍晚才说：“在这儿！就是这块地方！可以种了。”

我在一棵不久前才种上的小松树旁遇见凯恩的孙女，她当时正在整理母牛弄坏了的篱笆。

老太太自我解嘲地对我说，在普希金家的这些地方住惯了，像猫似的，无论如何也不想去列宁格勒了。尽管她早就应该去了。她管理着列宁格勒石头岛上的一个小图书馆。她一个人生活，没有子女和亲属。

“不，不，”她说，“您不要劝我打消这个念头。我一定到这儿来死。这些地方迷住我了，我什么地方也不想去住啦。每天我都想出一些事情来，好托延行期。你看，我现在走访每个

村子，把老头儿们说的普希金的事都记下来。只是老头儿们尽胡扯，”她郁郁地补充道，“昨天一个老头儿说到普希金怎样被请去参加官府会议，他们问他：要不要跟拿破仑打仗。可普希金说：‘尊敬的国家长官们，如果你们的庄稼汉们一辈子都极其贫困，你们干吗还插手跟人家打仗呢。你们打不赢的！’”

凯恩的孙女是孜孜不倦的步行去各个地方——无论是雨天还是酷暑，在黎明或者黄昏。我有时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有时在三山村、有时在三山村的村边我居住的空荡而凉爽的村舍旁的沃洛尼奇墓地遇见她。

她有时候给我讲自己过去的生活，讲本省的著名的戏剧导演们和耽于饮酒的悲剧演员们（这些叙述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旧时代只有悲剧演员才是天才），最后，她还讲自己的爱情。

“您别看我现在是一个瞎忙的老太婆，”她说，“我过去可是个快乐的、个性很强的、美丽的女人。等到死后本可以留下一些有趣的回忆录，但是我总不能集中精力把它们写出来。我记录完老头子们讲的故事，又要去筹备夏天的节日。”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每年都把普希金的诞生日作为夏天的节日。数百辆装饰着绦带和瓦尔戴的铃铛的集体农庄的大车会合在普希金公园对面索罗季那面的草地上。

人们在草地上点燃篝火，跳着环圈舞，唱着古老的歌曲和新的顺口溜：

我们的松树和湖泊
十分优美动人，
我们要尽力地爱护
米哈伊洛夫斯克小树林。



当地所有集体农庄庄员都以普希金的老乡而自豪，他们爱护这个保护区不亚于爱护自己的菜园和田地。

我住在沃洛尼奇三山村公园看管人尼古拉家里。女主人整天摔碟子摔碗，还骂丈夫。她丈夫昼夜都常在这座公园里，有时跑回家一两个小时，即使是这点时间他还把老岳父或者小孩儿打发到公园去看着，她真是太需要这样的丈夫了。

有一回尼古拉回来喝点儿茶。他还没有来得及摘下帽子，披头散发的女主人就从院里冲进来了。

“上公园去，疯子！”她嚷道，“我在河边洗衣服，看到一个列宁格勒的小无赖闯进了公园，要是没有惹出祸就好了！”

“他能干出啥事来呢？”我问。

尼古拉飞快地跑出家门。

“这真够瞧的啦，”他一边走一边说，“弄不好要折断一根树枝儿呢。”

但是事情总算顺利地结束了。“小无赖”原来是著名的画家纳坦·阿里特曼，尼古拉也就放心了。

在普希金保护区有三座公园：米哈伊洛夫斯克、三山和彼得罗夫斯克。它们都各具特色，正如他们的主人一样各不相同。

三山公园充满阳光。甚至在阴天也使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一片片金色的阳光洒在欢乐的青草上、绿色的菩提树上、索罗季上方的断崖和叶甫盖尼·奥涅金坐过的长凳上。公园深处夏日烟雾笼罩，阳光照射的斑点显得是很神秘的。这座公园似乎是为了家庭的喜庆日、亲切的谈天，为了在黑色的树叶帐篷下燃着烛光跳舞、少女嬉戏和愉快地倾吐心声而创造的。公

园里充满了普希金和雅泽科夫时代的气氛。

米哈伊洛夫斯克公园是一个隐士遁世的好去处。这是一座难以找到欢乐的公园。它是为了孤独和善于思考的人而创建的。它连同它那多年的老云杉稍显阴郁，高大，沉默，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像它本身一样壮丽的、古老的、荒凉的森林。只有在公园四周，透过经常滞留在古树穹顶下的昏暗，会突然现出灿烂的金凤花丛生的林中空地，还有潺潺流水的池塘。许多小青蛙蹦咚蹦咚地跳进池塘。

米哈伊洛夫斯克公园的主要迷人之处就是索罗季上方的断崖和普希金奶娘阿林娜·罗季奥诺夫娜的小房——这是普希金时期留下的惟一的一座小房。房子小而动人，甚至使人不敢上它破旧的石阶。从索罗季断崖上可以看见两片蓝色的湖，树荫茂密的小山和我们永恒的朴实无华的、浮着宁静的云朵的天空。

普希金外祖父——固执阴郁的汉尼拔——的房子也在彼得罗夫斯克公园里。从属于彼得罗夫斯克库强湖后面的米哈伊洛夫斯克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彼得罗夫斯克公园。它幽暗、潮湿，牛蒡草滋蔓，走到里面去，像进入地窖一样。牛蒡丛中拴着的马在吃草。荨麻牵扯着花朵，而到傍晚，公园里则蛙声鼓噪。嘶哑的寒鸦栖息在漆黑的树木上面。

有一天，我从彼得罗夫斯克到米哈伊洛夫斯克回来的路上，林中洼地迷了路。小河在树根旁呢喃低语，一个个小湖在峡谷里闪光。太阳落山了。宁静的空气是淡红和炽热的。

在一片林中旷地地上，我看到了高高的绚丽的雷电。雷电从米哈伊洛夫斯克的上空升起，在夜空中膨胀，像一座巨大的中世纪城堡，被白色的炮塔包围。雷电传来大炮的隆隆声。风



在旷野突然怒吼，然后消失在丛林里。

难以想象，沿着这条尽是树皮鞋脚印的普通的道路，沿着有蚂蚁窝和多节的树根，普希金骑的马走着一边悠闲地，一边还轻松地驮着自己沉默的骑士。

树林、湖泊、公园和天空，这几乎是普希金时代保存在这里的惟一的东西。这里的自然环境谁都没有触动。人们非常珍爱它，给保护区安装电灯时，为了不立电线杆子，便决定在地下拉电线。因为电线杆子将立刻破坏这些荒漠地带的普希多的魅力。

我曾经在沃洛尼奇墓地一带住过，那儿有一座用木料建筑的、古老的教堂。人们都称之为小教堂。这座教堂杂草丛生、屋顶长满黄色苔藓，通过接骨木树的密林才勉强可以看得见。普希金曾在这座教堂里追悼过乔治·拜伦。

树脂很多的松木刨花落满了教堂门前的台阶。教堂旁边正在盖一座小学校。

我住在沃洛尼奇的那段时间里，只有一次，一个戴着破麦杆草帽的驼背的神甫蹒跚地来教堂，小心地把胡桃木的钓竿倚到菩提树旁，打开教堂门上的沉重的锁。在那一天，沃洛尼奇有一位百岁老人去世了，人们把他抬到这里举行葬仪。神甫在葬仪之后又拿起自己的钓竿，慢步去索罗季钓诸鲦和小鳟鱼去了。

盖小学校的木匠们目送着他，突然一个人说道：

“消灭了的宗教阶层！在沃洛尼奇，在亚历山大·谢尔盖依奇时代，不是神甫，那是一个真正的旅长。那家伙是个害人的孝士。难怪亚历山大·谢尔盖依奇把他叫做‘害人精’。可是你瞧瞧这个人，他简直是损害农作物的甲虫，一个在草地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